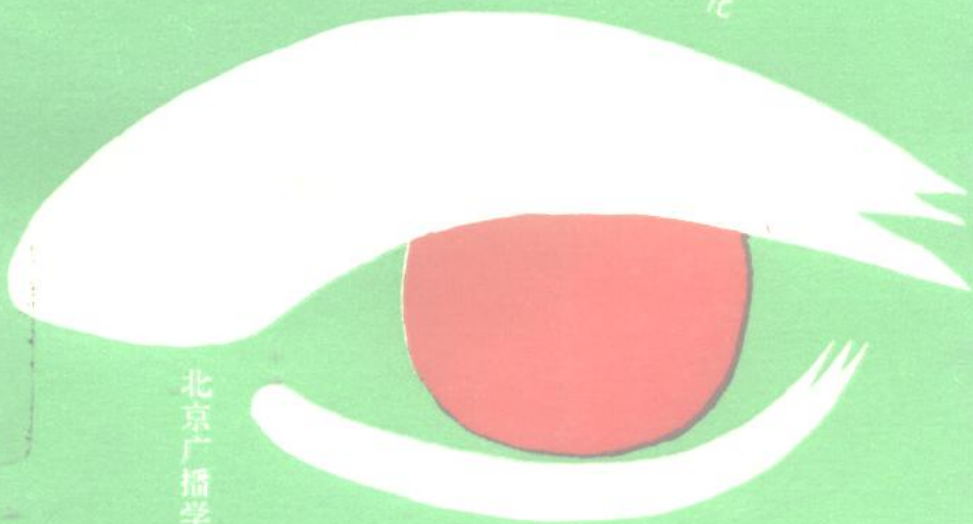


电视符号 与 电视文化

张 讴

- ★ 电视文化
- ★ 电视符号
- ★ 电视文化
- ★ 电视符号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 148 号

电视符号与电视文化

张 讴 著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朝阳区东郊定福庄1号)

北京东方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7.25 字数:154千字
1994年11月 第1版 1994年11月 第1次印刷

印数:2000

ISBN 7-81004-341-2/G·127

定价:5.90元

G-20
ZC

221

5

目 次

第一章	电视的研究方法	(1)
第二章	电视的符号	(14)
第三章	电视的代码	(35)
第四章	电视的功能	(64)
第五章	吟游诗人与电视的社会角色	(79)
第六章	电视观众	(93)
第七章	电视的形式	(114)
第八章	电视的现实性	(130)
第九章	电视节目的结构	(144)
	(一)荣誉与竞争——对竞赛类节目的分析	(144)
	(二)人格化的社会——对警匪片的分析	(155)
	(三)服饰中的神话与性——对舞蹈的分析	(171)
	(四)电视是一种人造现实吗?	(184)
第十章	内容分析——经验主义研究方法	(189)
参考书目	(205)

第一章 电视的研究方法

电视研究是发现一切与电视有关的新信息和在此基础上发展新认识的过程。它可以分为三大部分：(1)观众研究；(2)内容研究；(3)节目制作和电视机构研究。若想对电视理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就要把这自成体系的三个部分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半个多世纪的电视理论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已经使这三部分派生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学者们大都依据自己的兴趣对其中的一二个重点课题进行研究。

电视研究的范畴

具体地说，观众研究是探讨电视与电视观众的关系。许多观众研究，特别是那些由电视机构进行的观众研究，都把重点放在研究受众的规模和构成成分、受众的偏爱、观看动机和对电视节目的反应等方面。此类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收视率和增强竞争机制。观众研究的另一个任务是研究电视节目的效果或影响。电视影响的过程可以通过研究个体，也可以通过研究更广泛的范围如社会或文化的变化和持续性来获得。其研究范围包括认知程度态度、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现实的限定和受众中的关系模式。这种影响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经由其它因素如观众需求、环境或社会特征的催化或传递来间接影响观众。观众研究也可以研究观众对电视媒介或一个具体

节目,甚至一条新闻的反应。

内容研究是研究电视媒介的内容。如果不对引起观众反应的节目内容进行必要的探讨,我们就很难对观众研究的结果进行正确估价。尽管内容研究可以展示节目内容的特征,但其自身却难以阐述它对观众的影响,只有电视研究才能对此得出一种结论。但是观众对电视节目的反应——文化层次不同的受众往往对同一个节目做出不同的反应——可能与节目制作者的初衷大相径庭。我们可以通过节目内容来对制作者的制作目的和其存在的社会环境进行推论(至少应该做出一种假设)。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对电视观众更感兴趣,我们就应该研究观众;如果我们想探讨节目制作,我们就应该深入到电视媒介机构之中。内容研究只是对观众研究和节目制作研究的补充,而决不能取而代之。

电视节目并不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人的活动的一种产物。我们有必要对节目内容进行探讨: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如果我们认为某一个电视节目仅仅是为了取悦迎合一部分人,我们就应该探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这是政策和媒介机构所致,还是偶然的失误?这一现象是制作者的决策效应呢?还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节目制作方式?还是由于电视机构内部的体制和它与权力机构的关系所致?若想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就不得不研究电视机构里的实际制作者、制约制作者的电视机构,以及其它影响电视制作的因素。目前研究这一课题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是采访制作者、在电视演播室内观察节目制作、分析探讨媒介机构和政府与媒介的关系。但是本书将着重探讨内容研究。

电视内容(信息)研究

我们分析传播内容的目的是为了对制作者或者传播过程做出论断,或者研究其媒介可能对观众产生的影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同其它媒体一样,电视节目的内容也受诸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制约因素包括政治、法律、一般性工作程序,以及那些集体创作参与者的职业和个人观念,当然还要受其它因素的制约,例如,一条电视新闻的报道似乎有失公允。电视记者只报道了现象的一面,却没有涉及另一面。这往往是由于记者难以得到“另一面”的录像和信息的缘故。而观众看到的报道可能是记者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之后的结果,你无法了解某一事件报道的可能存在的另一种“版本”,除非你已经看过编辑室里所有关于该事件的素材,而内容研究本身却难以研究这些。

一般来讲,内容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部分。它们是数据研究和质的研究。

1. 数据研究方法

数据研究一般是把媒介内容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分门别类地纳入预先设定的类别栏中,然后计算其出现的频率。例如,一个英国研究媒介对种族关系报道的小组曾经广泛研究了1965年至1970年间英国报纸对种族关系的报道。他们首先选取报纸样本,进而把样本中所有涉及黑人和白人的报道列为分析单元。分析单元中的每一项都按照预先设定的类别栏逐项填入。类别栏包括犯罪、歧视、移民和教育等二十项。这个研究小组的分析表明,有关黑人移民、移民控制和黑人与白

人矛盾冲突的报道最为突出,其出现频率和所占报纸面积要远远高于报道黑人在住房、接受教育和就职方面所面临的困难。通过与其它研究进行比较,研究小组认为,报纸在报道有关英国黑人的消息时,往往把他们描绘成令人“头痛”的乌合之众,却很少报道那些令黑人“头痛”的社会问题。

另一种数据研究方法称作“偶然性分析”(contingency analysis)。“偶然性分析”探讨的是媒介内容中不同成分的组合关系和程度。例如,在上述的种族关系研究中,研究小组在分析了有关内容的新闻标题后发现,那些少数民族(如印度人、牙麦加人和香港移民)名字出现时,经常与暴力或带有冲突色彩的字眼(如争斗、暴乱、抗议、帮派)联系在一起。另一项数据分析显示,在涉及民族关系的电视新闻播出之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政治家总是对那些反移民的观点感兴趣。这些数据使研究小组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媒介报道中的非白人十分爱闹事,他们对英国社会构成了威胁。

还有一种十分繁杂的数据研究叫“赋值推断分析”(evaluative assertion analysis)。此种研究方法旨在分析媒介对某一具体事物、人或某种现象的态度(赞成或反对,肯定或否定)。这种数据处理主要是用于情报收集,例如,通过分析几年来的社论来研究该国政府的政策变化等,但是此种方法十分繁琐,而且往往会把真实态度的复杂性简化为对或错、肯定或否定。

内容研究要求研究者要有一个清晰的研究范围。首先,要对研究内容做到心中有数,例如,如果要分析电视节目,那么这些节目包括新闻和文娱节目吗?还是仅仅指电视剧呢?如果要研究儿童观看节目的方式,你仅仅研究儿童节目呢?还是

研究儿童观看的所有节目呢?第二,研究者应该懂得如何确定内容的具体类型,如何把这一类同另一类区别开来。哪些节目被认为充满着暴力的?哪些被判定为除暴安良的?它们之间的界限是什么?在实际分析中,这种划定界限的工作常常需要反复论证。

2. 质的研究方法

质的研究包括一般性评价、不同类型的“文学批评”以及源于语言学和人类文化学的符号学研究。英国社会学家汤姆·伯恩斯曾经说过,艺术的目的是理解生活。社会科学的目的是理解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因此,我们讨论的重点将放在后者即符号学上。符号学已经同社会学、心理学和马克思学说被列为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理论工具。

符号学主要是把语言的研究方法应用在了分析社会组织、变化过程和行为方面。社会与语言的关系,或者说社会与符号结构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重要研究内容。语言系统和使用这一语言系统的社会被看成是一种重要、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语言研究为探讨社会和其特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语言范例现在已经被一些符号学家用来研究整个文化现象——包括那些从前与语言研究范畴不搭界的文化现象,如摄影、服饰和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语言”的宽泛意义便出现了。

对于符号学家来说,这个世界从本质上讲不是一个世界,而是一篇文章。文化是一系列可以理解的符号和象征,是具有意义的体系。文化是一种具体的存在,有些具有相对的持久力,如人工制品和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习俗;有些则相对短

暂一些。然而，作为能够理解“意义”的系统，文化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这种变化是特定文化传统中的转化。这种传统是获取意义的唯一最有价值的资源和其它实践活动的基础。

西方人对符号的思考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只是到了本世纪中叶，符号学才逐渐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随着存在主义影响力的减弱，许多学者不再用绝望、孤独、苦闷的心理来理解人的本质。结构主义的诞生把人们的兴趣转移到文化符号的研究上来。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心理学教程》在六十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研究兴趣始终围绕着以语言为主的符号系统，通过语言研究来探讨符号在社会文化中的意指作用。美国哲学家皮尔士也是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利用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拓宽了符号学的研究范畴。运用不同的标准对符号分类是他的突出贡献之一。另外，以德国哲学家卡西勒为代表的符号学派也很有实力。他强调“人是符号动物”。苏珊·朗格对卡西勒的观点作了系统阐述。应该说，作为技术性的分析手段，符号学在具体学科中已经显示出它的优势和乐观前景。

符号学已经成了当今西方社会研究的一个热门学科。在分析哲学、语言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西方愈来愈重视对符号学的研究。英国哲学家和美学家 M. C. 比尔兹利曾指出，从广义上来讲，符号学无疑是当代哲学以及其它许多思想领域的最核心的理论之一。罗兰·巴尔特明确地说，无论从哪方面看，文化都是一种语言，即文化都是由符号组成的，其结构和组织形式同语言的结构一样。

符号学是符号的科学。它首先要探讨意义是如何在“作品”(电影、电视节目和其它艺术作品)中产生的。符号学还要

研究什么是符号和它们的功用。索绪尔对符号分析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述。他继承了欧洲的一种哲学思想,即世界是由独立存在的客体组成的。他认为语言是被称为“词语”的各个单元的集合体。每个单元都有附着于它们的独立“意义”,即一种语言除了它自身的历史之外,还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客观存在。它们存在于一个历时的或者历史的范围之中。因此,语言应该作为一种完整的形式,一个“统一场”和一个自足的系统来研究。语言既有它的历史范围,也有它当前的结构属性。

索绪尔把符号分为两部分,即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能指是指一个字的发音,一幅画的形式和色彩。所指则是指它所具有的或者它所传达出的含义。所指(概念)和能指(音像)之间的结构关系构成了语言符号。由于语言基本上是一个听觉系统,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只在一段时间内展开。一幅画则能够在同一时间展示和并列它的各种要素。

美国哲学家皮尔士认为,无论任何事物,只要它独立存在,并且和另一种事物有联系,同时可以被“解释”,那么它的功能就是符号。皮尔士强调了符号的“三和一”关系:图像、标志和象征。图像是由其客体本质决定的符号。尽管符号可以是图像,但是完美的图像并不存在。图像符号和它的客体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标志是与其客体有着某种事实或者因果关系的符号;象征则是代表超过自身含义的、由同一个社会圈里的人默认的符号或者行为。我们不妨列表加以说明(见表)

符号学研究的基本原则表明,单独的一个符号并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从它与其它符号的关系中获得的,即它被它不能表明的东西所限制。如果“热”一词不能与“冷”一词相对,

“热”本身并无意义。“红色”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认知方式告诉我们它不是绿色、蓝色或者黄色。当我们使用“红色”一词时,它并不仅仅产生一个红色的概念,它援引了全部色彩的法规——红色不同于其它颜色的方式。

	图像	标志	象征
表明方式	相似	因果关系	约定俗成
实例	图画雕像	烟/火 症状/疾病	单词、数字 红旗
过程	可以看到	可以领会	必须学习

那么,意义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符号学的研究是把语言学作为一种模式,并把其概念用于分析其它现象,而不仅仅局限于语言范畴之中。这种研究方法是把所有交流(电视新闻、戏剧、电影或者宗教仪式)都当做一种语言形式来研究。甚至一些东西如烹调、服饰和头发样式也适用于此。例如,一群按着“嘻皮士”的样式着装和处理发型的青年,实际上是在陈述这一群体的特征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乔纳森·卡勒说,语言学用于研究其它文化现象的概念基于两个基本原则:第一,社会和文化现象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事物或者事件,而且是具有意义的事物或者事件,即符号;第二,它们的本质意义被一张关系网所限定。

可以说,符号和关系是符号学分析的两个最基本概念。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符号系统。这个连续剧的意义来自符号和联结起符号的系统。这一系统并非显而易见。它只能从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中获得。

在符号学分析中，我们要武断地、暂时地把内容与形式区分开来，以便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构成客体的符号系统上。例如，一顿饭不能只被看作是饺子、烙饼、海参和鱿鱼，而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它传达出的意义可以包括社会地位、爱好、习惯、传统和民族等。

索绪尔说过，语言是用以表述观点的符号系统。索绪尔对符号系统的阐释启发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研究媒介。我们不仅可以研究象征性仪式或礼节性客套话，而且还可以把电视广告、肥皂剧、纪录片等看作符号系统来研究。

符号学的另一个特征是其约定俗成的规则。这种常规决定了不同符号的组合关系——不同的符号可以联合、并列或者按一定的顺序排列。例如，在标准的英语中，数字“3”之后不能接单数名词。符号学家认为，所有语言（和所有的交流）都依赖于这种规则。符号学分析的目的就是阐释这种规则。换一句话说，就是解释不同符号之间的潜在关系，这种关系正是一般人意识不到的。符号学家威廉在《玫瑰的名字》中说：“我不怀疑符号的真实性……它们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用以调整自我的东西。我难以理解的则是符号之间的关系。”（参见埃科，1984年，第492页）。正如人们天天都讲话，但不一定就能够解释其语法（即把词和词组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联结起来的规则）一样，观众在观看电视节目时，也未注意到屏幕上的不同图像、人物和事件并列在一起的规则。而这种规则的意义在于传达出社会中的一种具体形象，一个创造者所理解的现实社会。存在于一种具体交流形式之中的“规则”包含着一种世界观，对现实世界的描述，以及对事物应该是何种样子的理解。

简单地说,观众最爱看的电视剧采用的几乎是同一种规则——正义战胜邪恶。在我们分析其规则时,如果采用数据研究方法,我们只能得到一点十分表象的东西。例如,主角(常常是女主角)在整部电视连续剧中往往要遭受很多磨难,但最终都是胜利者,因此,主角在剧中遭受多少挫折并不重要,而真正具有意义的则是其主题——正义战胜邪恶,恶有恶报和善有善报。这种交流的最终结果是强化了一种道德法规、一种自然的、可能的和令人向往的社会生活。符号学家特别善于对潜存于大众传播之中的规则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解释。他们认为通俗电视剧和电视广告之类的手段只能强化一种主导意识和现存的社会秩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符号学的要点总结如下:

- (1)它的重点在于对作品(电视、电影、戏剧等)意义的阐释。
- (2)分析的焦点是符号,即它们表明了什么。
- (3)符号的意义取决于它们与其它符号之间的关系。
- (4)这种关系受到了与符号系统相一致的规则或常规的制约。
- (5)所有的符号系统都近似于语言规则。它们排列在一起,组成一个使符号组合具有一定意义的规则,符号利用这一规则来传达一定的意义。
- (6)作品的潜在规则,即它的基本意义,可以用近似于语言分析的恰当分析过程来发现。

在广义的符号学涵义上,文化被理解为人和世界之间所确立的各种关系的系统。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是交际对话:社会对人的行为作出反应,以某种形式规定这种行为,人也对社

会作出反应。

符号学分析现在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大流派。在二十世纪初叶，布拉格和俄国的文学评论家运用符号学对民间故事和文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们可以说为整个文学批评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学者对符号学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述，其中比较著名的学者有罗兰·巴尔特和恩伯托·埃科等人。

符号学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从电影、戏剧、建筑、形体到动物(如动物符号学)，可谓无所不包。它已经应用到了所有有关信息交流和传播的研究领域，并且取得了许多独具价值的成果。不少符号学者认为符号学是解释性科学之母。这不免有些夸大其辞。在理论界，争议一直存在。

学术界对两种研究方法的争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数据研究方法和质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符号分析)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符号学派在批评数据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时，经常引用数据研究的定义。贝雷尔森(1952年)曾经说过：“内容分析是一种客观的、系统的、用数据描述清晰可辨的媒介内容的研究方法”(第18页)。批评者则指出此种内容分析很难做到十分客观，这是由于分析者的目的、理论偏爱或者偏见会直接影响到对内容范畴的划分。例如，把一条新闻划入经济、政治或者社会范畴，而不是暴力或者非暴力范畴，表明了分析者对材料的不同看法或者不同的理论依据。这些批评者认为，只有对潜在内容(内在符号和隐含的意义)进行研究才能获取富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对显而易见或者表面的(可观察到的)内容进行分析只能获得一些肤浅的结论。

他们认为把那些在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描述看作最富有意义的内容是错误的,而那些偶尔触及到的或者作者故意含而不述的东西可能对受众产生更大的影响。奥利弗·伯根林(1972年)写道:我们不妨想象有这样一部影片,主角是一个歹徒,他在极端阴森可怖的光线中有一系列展示其性格的活动,而且观众也可以看到他的某一个行动。这一行动令人吃惊地映射出他的美好情感……我们显然不能从对他恶意行动的统计数字(十次或者二十次并没有什么区别)中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问题的关键在于:当许多恶意之举与一个善良的行为并列在一起时,我们赋予前者怎样的意义呢?

当然,对作品进行完全客观的内容分析是不可能的。分析家很难宣称自己的分析十分客观,除非两个分析者用同一种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事实上,我们没有理由采纳贝雷尔森对内容分析的定义。在进行内容分析时,仅仅依靠不同类别的出现频率来分析其内容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媒介专家可能对深层含义更加感兴趣,但是深层含义需要通过表层分析来获得。当表层内容被描述得愈清楚,我们对作品内容研究的可靠性也就愈高。数据分析提供了把握表层意义的有效方法。这些数据的意义在于它是从有关概念中获得的推论,而不仅仅是对数据的收集。例如,“教育”和“榜样”出现在报纸上的次数对于我们并没有实际价值,如果把它们出现的频率放在政治与媒介的关系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就能从中获得一些重要结论。

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任何单一的理论工具都难以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的分析。主张数据研究的学者也曾经对符号学的分析方法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符号学的随意性

太大,主观色彩太浓厚。这种方法难以保证两个人对同一部作品的研究得出相同的结论。符号学的研究过分依赖个人的洞察和思辩能力。许多学者认为符号学不过是一种思考方法,但是数据研究和符号研究并不冲突,相反,它们可以弥补对方的缺陷。在研究过程中,深层结构分析需要表层分析提供的数据,表层分析需要深层结构分析来理解其意义。

第二章 电视的符号

符号学是研究事物符号的本质、发展变化规律、意义和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的学科。符号学与哲学上的认识论有着内在的联系。符号学的理论应用到各具体学科,便产生了某一学科的符号学,电视符号学便是其中之一。

符号学在英语中有两个意义相同的名词:Semiology 和 Semiotics。不同国度的人对其中之一的偏爱表明符号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以及这一学科有其不同的历史渊源。Semiotics 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来的,而 Semiology 则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皮尔士的著作中。尽管学者们使用的名词不一样,但是,符号学所研究的内容却是一致的。它的内容包括符号与其意义的关系和符号组成代码的方式。我们在这一章里将重点讨论符号,在下一章里将把重点放在代码上,同时,我们将把其内容与电视的表述形式结合起来探讨。

符号、能指和所指

费迪南·德·索绪尔被公认为欧洲符号学之父。他首先阐释了这样一个概念:能指+所指=符号。能指是一个实在客体,如声音、文字或者意想。所指则是概念(与能指没有必然联系)。符号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的联想性整体。应该指出的是,这样分析仅仅是为了阐释的方便,事实上,能指与所指不可